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of Wolfram Eberhard in the Study of Sinology in Middle-earth

Qing Che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Wolfram Eberhard (temporarily translated as Ai Boha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once taught at the Faculty of Letters, History, and Geography at Ankara University. Through extensive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his profound knowledge of Chinese folklore and history, he conducted research on ancient Turkish history, covering fields such as Sinology, folklore, and Turkish history. His numerous academic work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urkish Sinology and historical studies. This paper traces Professor Eberhard's research trajectory in Sinology, aiming to briefly summarize his pioneering role and significance in Sinology studies between China and Turkey.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also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conceptual debate between "Chinese Studies" and "Sinology"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both countries, drawing insights from Professor Eberhard's research approach.

Keywords: Eberhard; Sinology; Turkish history

浅论Wolfram Eberhard对中土汉学研究的开拓意义

陈清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上海 201620

摘要: Wolfram Eberhard 教授 (中文学界暂译为艾伯哈) 曾于安卡拉大学文史地学院任教，并通过大量中国史料及其对中国民俗历史的知识积淀开展土耳其古代历史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汉学，民俗学，土耳其历史等，其众多学术著作作为土耳其汉学及土耳其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梳理艾伯哈教授的汉学研究路径，试图对其在中土两国汉学研究中发挥的开拓作用及意义作简要整理归纳；本文也试图从艾伯哈教授的汉学研究路径出发，对中土两国学界存在的中国学/汉学概念之争作一简要梳理。

关键词: 艾伯哈；汉学；土耳其历史

1 引言

近年来，如何在国际社会建立中国话语体系，如何有效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和中国梦的理念，是很多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注意到，汉学的传播和发展，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积极支持，其研究成果和研究视野理应持续为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交流和融合提供新的机遇；而全球化趋势中的“中国学”/“汉学”研究，需要学者们建立“世界性”的视角，亦即：“中国学”或者“汉学”研究应具备体现世界文明发展方向和普遍价值的世界视角^[1]。之后，也有学者继续指出，作为“世界性”的中国研究，应具备客观和比较的学术视角，将16世纪以来的汉学研究放回到16世纪至今世界各国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比较和观察，寻求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积极的中外

中国研究对话机制^[2]。著名学者陈寅恪曾强调，（中国学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以“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来开展研究。陈先生所述，不仅是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对学人的要求，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来看，依然是对涉足区域国研究领域学人的基本要求；在现今国家大力推动“世界性汉学/中国学研究”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来重新审视建构上述学术视角的必要性。涉足中国研究，乃至某一具体区域国别领域的研究者，以谦虚审慎的态度学习关于该区域的相关知识时，也需要深入该区域，身体力行感受和了解该区域内的文化，以一种域外陌生人的身份来重新体验研究者自身似乎早该熟悉的知识并结合具体体验来重新评价原先的知识谱系，只有通过这种身体力行的研究，才有可能建立起世界性的中国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

2 研究分析

德国汉学家Wolfram Eberhard教授在践行此类区域国别研究方面，可以说是吾辈先驱。然而国内对于艾伯哈教授的研究和译介较少，对于其在汉学及由汉学研究发轫的土耳其相关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成果介绍也并不多。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介绍艾伯哈教授的汉学及相关的土耳其研究路径，简要总结其在相关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开拓作用，并以此对中土两国学界目前存在的汉学/中国学名实论争作一简要评述。

艾伯哈教授本人的汉学研究兴趣源于他的叔叔Rolf Muller的指导，其博士论文是关于汉代天文学和占星术的研究。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通过学习古汉语和社会人类学，艾伯哈开始思考如何将社会学方法（尤其是民族志）和历史研究相结合。1934年的中国之旅更开启了他人生最为重要的研究主题：民间故事的采集以及解读。这一研究主题贯穿艾伯哈的学术生涯，而同这一主题相结合的中国历史思考，是其学术生涯的另一大成就^[3]。同时，其在安卡拉大学的从教和研究经历[1937-1948年艾伯哈受聘为安卡拉大学史地学院汉学系主任。既影响了其个人研究路径的转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耳其的汉学及土耳其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艾伯哈本人在就职安卡拉大学期间曾指出，对于土耳其人来说，汉学应成为一门国家学科；而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尔克在设立安卡拉大学汉学教职时也提出，土耳其汉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根据中国史料考察古代土耳其人的历史和文化^[4]。在土耳其从教期间，艾伯哈基于中国史料开展田野调查，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在之后任教伯克利大学期间，艾伯哈也曾申请项目前往土耳其继续开展相关调查。在这一系列社会调查中，通过对比史料和现实社会材料（主要是土耳其东南部民间传说），艾伯哈对于亚洲历史进程中游牧文明和农耕定居文明的互动模式提出了全新的认知角度。艾伯哈在1953年前后对于土耳其东南部的游牧部落进行的考察中发现，在安纳托利亚中部高原至南部地中海海岸的地理气候条件的影响下，该部落数百年来保持了定期迁徙的传统。每年10月该部落由中部山区出发，向东南部海岸迁徙，在这一过程中该部落同沿途定居的亚美尼亚族人建立贸易往来。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中央政府管理制度如何变迁，都

未对该部落的迁徙习俗及其建立起来的部落贸易网络产生重大影响。艾伯哈根据土耳其学者博拉塔夫收集的民间故事和他自己在实地考察中记录的口述故事^[4]推断，在历史进程中看似受到自然地理条件影响更大的游牧民族在融入土耳其社会主流文化过程中处于更为主动的位置，具体表现为：游牧民族的部落领袖从未失去对于部落民及贸易网络的直接掌控，奥斯曼帝国时期这些领袖受册封成为地方领主，在共和国时期则摇身一变成为大土地主、农场主或牧场主，这些部落领袖对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直接影响远超过中央政府和部落周边的农耕定居文明。艾伯哈在考察口述史过程中发现，在以史诗体裁为主此类口述史中，这些游牧民族并没有接受中央权力直接管辖的自觉，他们认为中央政府给予的官职和称号只是方便让他们在部众中拥有更高的号召力，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融入帝国中央集权管理体制。

基于以上在土耳其东南部游牧部落的实地考察并辅以相关口述史映证，艾伯哈认为，游牧文明在和定居文明产生交流互动时，游牧文明对于整体社会文明融合的影响力，可能超出以往欧洲中心论学者们的认知^[6]。这一视角对于客观评价中国传统史观中的游牧民族作用也应产生积极影响，事实上，已有日本学者客观辨析了西晋末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历史进程及该进程对于中华民族整体历史文化融合过程的积极影响^[7]，对于游牧文明影响力的客观考察及评价在欧亚两端学者探索区域历史进程的努力中不谋而合。

艾伯哈在之后的讨论中^[5]援引博拉塔夫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上述口述故事在折射社会结构变迁扩充内容的同时，其体裁也从过去的长叙事史诗逐步演变为适合配乐唱诵的吟游诗体。在从土耳其东南部各乡镇间游走的吟游诗人处收集口述诗歌材料的同时，艾伯哈也就吟游诗人行走的路线和过去部落迁徙的路线进行了比对，并进一步确定土耳其东南部诗歌文学体裁及其叙述传承的演变反映出游牧文明给该地区族群文化带来的结构性变化。而对于这种文学和社会结构的相互影响的有效考察则有赖于学者自身在历史思考中对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在其1957年关于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中^[8]，艾伯哈承认，自己在历史思考中的社会人类学调查方法运用，受到了法国汉学家葛兰言解读中国古代经典《诗经》时的视角影响，早期人类部落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往往是同特定的部族以及其文化特征联系在一起的。

艾伯哈在思考历史文本时,跳出了单纯文本内容的束缚,并进一步文本置于其发生的历史社会环境下,拓展了文本的时间意义;这一研究传统持续贯穿了艾伯哈的学术生涯。其对于故事和传说的考察,不再仅限于文学和文字本身的考察,而是融合了社会学及历史学的视野,通过考察和比较故事讲述者的社会身份(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讲述使用语言等)以追溯故事和传说源起的历史文化背景^[9];同时,关于故事本身内容演进和体裁变化的考察,也能够帮助学者窥探到特定族群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身份认同变化。艾伯哈的汉学研究既关注现实社会中的社会结构(故事及其讲述者),也关注社会结构产生的历史源头(故事的流传进程及故事文本反映的历史进程)。

通过研究分析可以看出,艾伯哈从社会学和历史学视角考察土耳其古代历史的过程中,加深了其对于突厥文明、中华文明和亚洲文明交流进程的理解。其个人的努力,使得土耳其的汉学研究不仅对于中土两国古代民族文明研究意义重大,对于整个亚洲文明古代交通史的建构和书写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土耳其的汉学研究更多集中在对于中国史料中匈奴人,突厥人和回鹘人历史的考证^[4];这一趋势脱离了艾伯哈教授建立起来的历史叙事传统,一定程度上使得土耳其汉研究成果不为世界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所关注。而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在关注海外汉学研究时,更注重厘清“汉学”,“国学”和“中国学”三个概念的区别,综合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学的讨论,国内学者更关注以下主题:

(1) 如何定义中国学和汉学的内核,中国学是否是一种从国人视角出发对本国文化的理解阐释;

(2) 中国学的研究是否应置于全球区域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之下,为中国学研究确立世界视角;

(3) 中国学如何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在全球化时代构筑一个中外学者都能参与的,关于中国历史进程讨论的平台^[10,11]。

综合中土两国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在中国学者以“中国学”或“中国研究”为名推动中国学研究继续走向世界的时候,本该同中国的中国学研究有更多有益互动及对话的土耳其汉学研究似乎走向了简单的古代史考证,这一发展趋势有悖于艾伯哈建立土耳其汉学研究的初衷。另外,无论中国学者,还是土耳其学者,都有将精力置于“中国学”,“汉学”和“国学”名物论争的倾向;笔者以为,参考艾伯哈作

为汉学大家的研究经历和路径,就能发现这种纠结于名物的论争事实上分散了汉学研究的深入和中土文化的深入交流;尤其在海外汉学研究成果不断被引入国内学界的时间点,这种论争其实不利于中国学者倡导的中国学/汉学世界研究视角的建立,所幸,如上文所言,已经有很多学者认识到学界需要为中国学研究建立全球视野,世界视角,进一步推进中国学研究同全球区域国别领域研究的融合。

3 结论

在简要回顾艾伯哈教授留下的学术遗产后,无论是目前困扰中国学界的“中国学/汉学”概念之争,还是限制了土耳其汉学界研究视野的古代史料困境,都不应成为继续掣肘中土两国汉学研究推进和交流的因素。通过梳理艾伯哈教授的研究路径。可以看到,汉学研究的突破需要依赖现实社会调查和历史研究视角的有机融合。现实的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不可能脱离历史进程的考察;对于历史进程的社会学视角考察,则有助于我们跳脱出过于简单的历史文本解读和想象。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曾对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关系做出过经典的论述:“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可以被称为经典社会分析的是一系列可以界定、可以利用的传统,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正是在于该学科能有效整合不同学科的场域,诚如美国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言,区域研究类似于药品研究,而人类社会则与人体器官功能相对应——“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细菌学,甚至心理学和一些社会科学”——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开展精密合作的焦点”。

回顾艾伯哈对于土耳其东南部游牧部落的一系列研究,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对于游牧部落的现实社会调查结果从未脱离其对于历史进程和民俗文化演进的历时思考,刻意地将现代中国学和古典汉学的研究进行分割并不可取,两种研究应该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关系,是基于中国文明的,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社会科学。在现今推进中国文化传播的时节,中国研究应成为中国学者和海外学者开展中国研究对话的平台,是一种包含于世界文化体系,同时囊括了从古至今的系统中国文化信息的学科;而在建立这一平台的过程中,艾伯哈教授的学术遗产及其研究历程应成为中土

两国汉学研究者共同学习和对话的基础。基于这一学术遗产的中土学术合作，将来亦有可能为提升中华文化海外影响力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 [1] 方 铭，中国学研究视角的意义[J]. 学术月刊，2013,45(06):114-116.
- [2] 乔兆红，新时代海内外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多维解读——海外中国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竞争力[J]. 国外社会科学,2020(01):148-154.
- [3] Cohen, Alvin P, In memoriam: 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J]. Asian folklore studies, 1990(49):125-133.
- [4] Saritas, Ey ü p, On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Sinology Researches in Turkey[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5(3):293-298.

- [5] Eberhard, Wolfram, Change in Leading Families in Southern Turkey [J]. Literary Licensing, 1955.
- [6] Eberhard, Wolfram, Nomads and Farmers in Southerneast Turkey. Problems and Settlement [J]. Oriens, 1953(6).
- [7] 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 -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迁移 [M]，商务印书馆, 2019.
- [8] Eberhard, Wolfram,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ccording to socio-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J]. Neue Floge/New Series, 1957(7).
- [9] Eberhard, Wolfram, A study of Ghost Stories from Taiwan and San Francisco [J]. Asian Folklore Studies, 1971(30).
- [10] 吴兆路，中国学研究视域 [J]. 学术月刊, 2013,45(06):110-114.
- [11] 张万民，20 世纪西方汉学界的《诗经》文化研究 [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63(03):115-125.